

转换视角，发微探幽

——刘平著《文化与叛乱》评析

陈连营¹ 谢贵平²

(1. 故宫博物院, 北京, 100000; 2.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以往对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多从纵向的政治史、事件史角度入手,注重探讨秘密社会的组织渊源、系统流派、重要人物以及秘密社会的重大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聚焦于教门、会党的形成、发展、演变及活动的考证和争论。至于秘密社会的横向联系,包括他们与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则少人问津。

山东大学刘平教授撰著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①一书从文化角度入手研究秘密社会,多方面揭示了清代秘密社会存在的文化土壤及其文化内涵,探索出其走向叛乱的文化背景、思想根由和契机,阐释了文化与叛乱之间的关系。作者在此基础上对秘密社会的叛乱行为作出新的认识和评价,从而“把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②

一、《文化与叛乱》的结构

该书除导论和结语外,共有四章内容。导论部分从概念、研究目标、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方法等方面勾勒了全书的研究框架。

第一章以巫术和宗教(尤其以宗教异端)为重点,从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角度考察了清代秘密社会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作者认为,无论是巫术还是世俗化的宗教及宗教异端思想,都是秘密社会信仰的主要源泉,同时也对秘密社会及其叛乱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章和第三章具体探讨了清代秘密教门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对秘密教门的经卷、教义和“反清复明”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对巫术、符咒、禁忌、气功等文化现象在教门及其叛乱中的表现进行了详尽论述和客观评价,从而说明秘密教门为何能长期生存于传统社会并经常发动叛乱的原因。第四章具体讨论了清代秘密会党的文化内涵,认为会党中的“义”的观念有多方面的作用。巫术、宗教因素也是会党连结的纽带,社会习俗如歃血盟誓、械斗之风等对会党具有深刻的影响。

结语部分主要探讨了中国历史上农民叛乱的主客观原因,着重探讨了文化因素对农民叛乱的影响,从而对农民的反抗给予新的定性和评价,这不仅是作者重要的学术贡献,对预防和处理今日的社会反抗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文化与叛乱》的创新价值

(一)作者广泛运用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等理论和方法,以文化为视角来研究秘密社会,新颖独特,为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传统中国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社会,种种文化因素在人们的行为、活动特征上烙下深深的印迹。开篇伊始,作者就对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人们通常使用“传统文化”一词指代过去的、历史的文化,这是一种静态的概念,并且往往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色彩。传统文化的两个显著特征便是人民性和延续性(内容提要P2)。所谓“文化传统”,意指文化传承,也就是以往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在当时与现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与流变(P6),作者以“文化传统”作为该书的基本视点。

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因阶级地位、经济条件的不同,在信仰、行为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秘密社会的主要群体是破产农民、城市平民、手工业者、运夫、船民、僧道医卜、散兵游勇等,他们由于长期生活在下层,得不到正规教育,深受下层文化(或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环境的熏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和信

^① 刘平:《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② 南京大学蔡少卿教授语,见该书《前言·鸣谢》,第10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仅注页码。

仰体系。这种文化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将对其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清代的秘密社会及其发动的叛乱，就广泛地借用了当时社会的文化结构功能。

在新旧世纪之交，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思想阴魂不散，一般民众对巫术、宗教、谶语、禁忌、气功的迷信等等，仍然在人们头脑中延续，这就警示我们：文化传统并不完全受到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的制约，其中的负面因素如封建迷信思想、反政府思想，在当今社会仍有传播的土壤和空间。由此可见，清代秘密社会的叛乱，包括当今社会农民的反抗行为都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只有从民间文化出发，才能从更深层次上把握民众叛乱的思想渊源和活动特征。

此外，本书还采用分类、列举、比较等方法，对流行于秘密社会的巫术、魔术、法术、符咒、谶语、谣言、揭贴、占卜、扶乩、戒律、誓词、纪律、隐语、暗号进行较为细致的清理，揭开了秘密社会神秘的面纱，揭示了秘密社会与文化传统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作者通过剖析清代秘密社会生存、发展、反抗、演变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其思想信仰因素，揭示了秘密社会反抗的深层原因。由此得出结论：文化是秘密社会信仰的源泉以及能够吸引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制定内部日常行为准则的依据；是内部组织得以维持和动员、组织民众叛乱的现成武器。在叛乱的过程中，又是鼓舞士气、振奋人心，提高战斗力的工具。这使我们对于秘密社会的产生、民众基础、行为性质以及文化特征，有诸多新的认识，为我们认识秘密社会的独特性、神秘性及其生存的顽强性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二）对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的文化内涵作出了具体、深刻、透彻的分析，开拓了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

秘密教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秘密教门植根于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与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从秘密教门的教义核心思想——“劫变观”与“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八字”真言）入手，细致分析了秘密教门如何利用下层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要，对正统宗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从而形成自己的救世理论，成为他们发动叛乱的工具，如“入教避劫”之说，既是各教门动员民众入教的手段，也是教门中那些抱有特定政治目的的人发动叛乱的阶梯。此外，作者还对清代秘密教门中的宝卷和“反清复明”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另一方面揭示了秘密教门叛乱的思想根源。

对于笼罩在秘密教门身上的那些引人注目而又使人不明就里的神秘因素，如巫术、符咒、谶纬、谣言、揭贴、占卜、扶乩、气功、武术、禁忌、隐语暗号等现象在教门中的反映，作者专门用了一章篇幅，进行了集中探讨和深入研究。使这些一般人看来十分鄙陋、荒诞、“妖妄”，同时也无法伸手去撩开其面纱的“神秘”因素变得不再神秘。这些落后的、愚昧的文化现象，根植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包含在中华民族的“一般精神”之中，这就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了秘密教门之所以能够长期生存于传统社会的原因。

由此可知，秘密教门的叛乱广泛地借用了民间社会大众文化因素，尤其是宗教、迷信与宗教异端思想。民间秘密教门大都利用、改造了正统宗教的思想资源和组织形式，宣扬世界末日将至，教主则奉最高救世主“无生老母”之派，特意下凡来人间普渡众生。只有加入本教门并笃从教主之命，方能免遭劫难，并回归老母所在的极乐世界——“真空家乡”。正是在这种信仰的支持之下，即使教首被杀，其妻儿徒弟仍然接续传习，甚至当整个上层宗教领袖集团都覆灭了，都不能阻止人们对它的信仰和对创始人的顶礼膜拜，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力量！^①

秘密会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清代秘密会党，以往的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是天地会的起源、性质等问题的争论，迄未息讼。作者跳出圈子，从社会风俗、民间文化、民间信仰的角度，去探讨秘密会党生存、演变的文化背景，揭示其文化内涵。

首先，作者叙述了歃血盟誓的历史渊源，以及它在下层民众中的广泛传播和在会党中的具体表现。指出下层民众的歃血盟誓，实质是在于虚拟一种血缘制度，作为正统家族关系的延伸和补充。一方面起着联络感情的作用，另一方面使许多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不安定分子借此纠党结会，逞其异志。书中还特别提醒我们：歃血盟誓并不是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专利，秘密社会以至普通反抗者，无论是土匪团伙，还是一般的民变、叛乱，歃血盟誓、杀牲祭旗都是其起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我们在谈论有关问题时，必须因人因事而论，将一般的民间结拜与怀有反社会、反政府目的的结盟拜会区别开来。

其次，作者探讨了秘密会党的思想核心——“义”。江湖义气在传统社会中有淋漓尽致的表达和传播，

^① 马西沙：《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7页。

对秘密会党的信仰有深刻的影响。“义”原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元以来，市井文艺和民间文学繁荣发展，特别是在明代，其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桃园结义”、“梁山聚义”等“义”的观念广泛流行于下层社会。会党是下层社会组织，无法从上层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文艺、民间文学就成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帮会文化的当然来源，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清代日益壮大的游民队伍是“义”的观念的主要寄生土壤，游民中的“精英人物”则可能利用这一思想作为聚众叛乱的工具，这在清代会党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另外，作者还具体分析了会党仪式、隐语、暗号、数字、誓词和戒律中所体现的“义”的思想。秘密会党的“江湖义气”是一种相对概念，并不真正体现底层群体的“平等”、“友爱”精神。正如蔡少卿先生曾提出：“秘密会党的组织形式摹拟了传统的血缘、家族制，在实际上采取了封建家长制的统治，并不具有什么‘民主’、‘平等’色彩。”^①

再次，对于以往研究者忽视的秘密会党中的巫术、宗教、迷信等因素，作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教门与会党都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巫术、宗教的影响尤甚(P283)。作者指出，天地会与佛教似乎有不解之缘，从嘉、道以后的洪门仪式来看，道教的因素可能更多一些。从许多天地会个案来看，巫术的因素也不容忽视，算命、测字、风水、谶语等迷信现象多有出现。在各种洪门秘籍中，儒家伦理说教占了相当比重。所以，会党与巫术、宗教、儒家伦理等文化现象关系十分密切。由此我们可知：秘密会党也借用了传统社会中的文化内容，在他们未曾起事、叛乱时，便“合理”地蛰伏于民间社会。一旦时机来临，便迅速掀起一场场波澜(P291)。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文化现象的普遍性，从而理解秘密会党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表现出来的亚文化特征。

三、《文化与叛乱》的新观点

作者勇于提出新观点，察人之未察，明人之未明。这些新观点有些地方虽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对于我们更深入、更客观公正地研究秘密社会无疑具有重大的启发和指向作用。举例如下。

1、对宝卷的重新分类和定性。以往研究秘密教门的论著大都认为宝卷与秘密教门相伴生，宝卷即“邪经”，而民间文学研究者则把宝卷仅仅视为文学作品。作者从宝卷的缘起、流变及人民性、文学性入手，将宝卷细分为四类：一是宗教类宝卷；二是杂取宗教教义、民间故事、小说、戏文的文学性宝卷；三是秘密教门的叛乱性经卷；四是属于秘密教门系统的劝世经卷。其中第三种为叛乱性宝卷，第一、二、四类为非叛乱性宝卷(P114-115)。这种精细的分类和定性，揭示了宝卷与大众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秘密教门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形成的，其经卷（从形式到内容）、信仰是与传统的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混合在一起的”，“即使教门宝卷中浸润了‘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的叛逆思想，一般教门中人也并不会因此走上叛乱之路，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宗教迷信的满足，文化娱乐的欣赏，行善积德的说教，而不是毁家纾难去造反”，“秘密教门的宝卷，尤其是叛乱性宝卷，必须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才能使叛乱成为现实”(P128)。这种分析无疑更符合实际。

2、对清代教门“反清复明”思想的探讨。对于“反清复明”思想的研究，以往学者主要集中于秘密会党方面，将“反清复明”思想视为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专利。关于秘密教门的“反清复明”思想，尽管存在很多材料（但也很零乱），但无人进行过系统研究。作者从大量档案、经卷资料出发，系统梳理了清代秘密教门的“反清复明”思想的根源、特点、表现形式和作用，归纳出清代秘密教门“反清复明”思想的两大特点：一是继承了历史上“借前代反当代”为号召的做法，二是借用民间文化，同时掺入了弥勒信仰、劫变观念等内容，尤其是谶语作为宣传工具(P145)。

3、对会党“忠义”思想的批判，以往人们都注意到“忠义”思想对会党的正面影响，而忽视了其负面影响。作者指出会党的“忠义”思想并没有反对封建专制的阶级意识，而是一种小团体的本位意识，团体之内追求绝对平均主义，团体之外则肆无忌惮地放纵其残酷本性，显示出流氓无产者的极端破坏性。会首渴望称王称帝，并以会内成员分封官爵王位作为内部激励的工具。“忠义”思想也是皇权主义的反映，其思想实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作者认为以往许多人对清代洪门中的“反清复明”思想大力赞扬，实际上这种思想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清朝灭亡以后，很多洪门会党很快就失去精神支柱，要么回

^①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19页。

归打家劫舍的犯罪集团，要么沦为反动派包括外国侵略者的鹰犬。所以“忠义”思想仍属于封建主义思想范畴。

4、以林爽文起义的个案分析为切入点，探讨社会风习与叛乱之间的联系。作者从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特定环境和传统文化入手，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新的结论：林爽文起义不是天地会有意识、有目的发动的一次起义，而是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地区拜把结会传统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一次裂变，事后清政府的竭力追查和残酷镇压，是天地会蔓延、演变的契机。分类械斗不仅是林爽文起义的诱因之一，也是起义发展、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应地，林爽文起义时的“义民”武装，也是分类械斗的产物，而不能单纯地视为地主武装，或是对抗“乱民”的“反破坏力量”（P314）。

作者不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尤其是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全局性观点。他在结语中提出的关于农民叛乱的定性及分类的标准，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农民反抗，包括当代社会反抗等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作者认为，以往仅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来涵盖农民反抗是不够的，用经济性斗争、政治性斗争来划分也有局限。由此提出以是否具有推翻现政权的目标及其相应的活动内容划分为两类：一是反社会行为（一般的民变、土匪活动、械斗等），一是反政府行为（如清代秘密社会在“反清复明”、“劫变”、“争天夺国”等思想观念指导下的叛乱）。并指出：“大多数秘密社会的叛乱，尽管其思想信仰中包含有明显的反政府倾向，但一般都旨在敛钱、抢劫等，应归于反社会性质”（P348）。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农民反抗，都不能一概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尤其是秘密社会发动的叛乱，更不能笼统的看作是农民“革命”。这与叛乱者的文化观念、思想水平有着密切关系（P348）。

作者探讨文化内涵只是手段，其宗旨是为了分析、重新评估秘密社会的造反性质。书中使用“叛乱”这个中性词而不用“起义”、“革命”，表明作者对秘密社会的造反持中立态度。作者在对秘密社会的文化内涵做了深刻分析后得出结论：“无论哪个朝代，哪个秘密社会发动的叛乱，都不能笼统的视为‘农民革命’”；“因为他们只能从他们所熟悉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寻找思想武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叛乱只能‘破旧’而不能‘立新’”，秘密社会的叛乱“具有进步的（正义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非正义的）或者两者兼有的作用”（P345-349）。

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下层农民的叛乱并不总是发生在生活最贫困、受剥削最严重的地区。作者指出，叛乱者的主观因素、文化意识信仰层面，既是导致叛乱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估量其叛乱性质的重要依据。因此，为避免偏颇，在研究农民反抗时，既要注意客观因素，也要考虑主观因素（P42）。主观因素也可被理解为叛乱者的主观作用。其中，叛乱领袖的作用不可低估。他们因膨胀的野心而发难，并以特殊的社会阅历、超人格的魅力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可以说，文化传统因素不但为农民变为叛乱者架起了桥梁，也使其在叛乱过程中迸发出巨大的勇气和力量（P347）。所以，农民叛乱不纯粹是被动行为，有时也是一种主动行为，更多的是主客观综合作用的结果（P346）。

作者认为，从秘密社会的信仰及其叛乱过程中所利用的文化因素来看，更多的是文化糟粕，其荒诞不经一目了然，盲目性、落后性、保守性的特征非常明显。从秘密社会的活动来说，其在叛乱过程中大肆破坏，很多时候是针对一般民众，其阴暗面和消极面也显而易见。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的秘密社会曾经发动过“反封建斗争”而予以一味的肯定。（P349）

任何一个不关注现实的史学家都不是真正的史学家，作者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关注现实的农民反抗。通过深入研究历史上农民尤其是秘密社会的反抗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处理当今社会反抗倾向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仍是决定中国社会是否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种种原因，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并未熄灭。缘于此，作者认为“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反抗问题”，以达到“预防和处理今日农民的‘反抗’倾向”。而对照历史，发现“以往农民叛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今日已经削弱或不复存在。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文化观念，习惯势力仍然像梦魇一般缠绕着中国的农民阶级”（P349）。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由种种文化因素孕育而成的社会反抗问题，仍然值得重视（P14）。

四、值得商榷之处

作为一项开创性的成果，其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本书虽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和突破，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中心论题“文化与叛乱”的关系，在书中未得到明确系统的阐述。

作者以大量篇幅论述了秘密社会生存的文化土壤及文化对秘密社会的影响，认为文化为秘密社会提供了思想和组织资源，但这仅仅是走向叛乱的一个必要条件，至于秘密社会是如何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走上叛乱道路的，他们发动叛乱的动因和契机又是什么？作者认为促动因素主要有三类：一是外在因素，如社会矛盾、自然灾害；二是内部因素，包括教义、组织、首领等等；三是神秘因素，即秘密社会的文化内涵。第三类实为第二个原因的补充（P159）。并以林爽文起义为个案研究，来说明秘密社会的思想根由、促动因素和叛乱之间的关系。

这一分析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仍不免有点以偏概全之感，因为宗教异端、社会习惯（宗族械斗、分类械斗）、民族冲突、土匪活动、民变都可能引发叛乱。而文章对引起秘密社会叛乱的重要因素——促动因素和契机虽在正文和结语中有所论述，但没有系统展开，容易使人误认为文化因素就是秘密社会走向叛乱的主要原因。

二是谋篇布局的问题。正如秦宝琦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该书内容上以客观分析见长，但有些地方过于铺张，如对秘密社会存在的文化土壤和宝卷的分析。有些地方未能充分展开，尤其是对叛乱首领的定量与定性分析（这是民众走向叛乱之路的重要一环）。作者如能参照上面所述，专辟一章，以叛乱首领的文化背景为平台，结合秘密社会叛乱的促动因素与契机，以及一些秘密社会叛乱的典型事例，来重点分析文化与叛乱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全面系统。

综览全书，资料宏富，考辨有力，论述精辟细致是作者的强项。作者用功之勤、搜罗之广、去取之妙以及眼光之敏锐、思想之深邃，尤其值得称道。虽有微疵，但瑕不掩瑜。新领域的开辟、新观点的提出，跨学科理论的运用及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使该书融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于一体。

作者简介：陈连营（1965—），河南唐河人，历史学博士，故宫博物院编审，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谢贵平（1972—），安徽无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